
短 长 书

和 平 的 真 义

戴锦华

二〇〇五年十月六日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公布了二〇〇五年的评审结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因“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而共享这一荣誉”。对被提名人（团体）数量空前（一百九十九）的这一年，评委会称和平奖得主的产生“没有特别困难”；国际舆论称“不出所料”。似乎只有欧洲网站上押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好事者，为最终爆出这么个热门而黯然。

然而，这一如此“名正言顺”的结果，与其说是出自众望所归，不如说由于“别”无选择。因为不同于诺贝尔的其他奖项，和平奖始终是对本年度全球境况、大都是危机境况的一份曲折回应。它经常展现的，是一种全球张力，一场现在进行时态中的危机状态，此番则更是一次微妙而尴尬的国际政治力量间的较量。

二〇〇五年，正值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自那一梦魇时刻之后，超过半个世纪，地球和人类始终笼罩在核威胁与核恐怖之中。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做出的长期努力，弥足珍贵、宽慰人心。然而，似乎没有太多的质询：如果说，广岛、长崎悲剧六十年是本届和平奖得主产生的重要参数，那么，这一年另一个更为直接而正面的被提名人——日本原爆被害者团体和其候选人何以不曾获奖。

若以某些地名来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绝人寰的悲剧，那么它们

间或是奥斯威辛、南京、广岛。但众所周知的是，除了奥斯威辛所提示的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罪行受到了清算、并在此后的六十余年被反复言说，南京大屠杀的惨剧或则因“死难者人数”成为“悬案”，或者索性“蒸发”为一团暧昧不明的历史烟云。而广岛，则成为被无数悼亡哀歌、和平祈愿所笼罩的一处无名废墟。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的罪人，事实上因冷战的开启、“亚洲”的位置而悄然从历史的审判台上逸走；那么，广岛悲剧的主犯，则始终成为历史叙述的一处悬置。历经六十年，已有足够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当事人披露的资料粉碎了“被迫动用原子弹以结束世界大战”的“神话”，于是，广岛、长崎，便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原子弹，而且是用于一次空前（但愿）绝后的巨型人体试验场。还记得读到的一则细节：广岛、长崎浩劫之后遭受严重放射性沾染的幸存者，在其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周身散射着荧荧磷光，甚至可以在暗夜的墙壁上投下苍白可怖的影子。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无论是作为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还是广岛浩劫中的受害者，都未曾影响日本与二战的胜利者美国、西欧一道，成为冷战的胜出者。于是，联系着二战和冷战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二战暴行史上南京元凶的暧昧与广岛罪人的缺席，在国际政治牌局上，原本是同一张纸牌的正反面。

而挪威诺贝尔奖将二〇〇五年和平奖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的直接动因，则如评委会主席米约斯所言，是“全球核威胁正在升级，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似乎无需多言，此处提及“升级”中的“核威胁”，所指正是近年来牵动世界瞩目的朝鲜和伊朗“核危机”。但稍加细查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如此真切却又荒诞不经的国际政治焦点：制造了全球“核威胁”的，不是总储量足以三十次将整个地球化作焦土的既有原子弹，不是现今拥有核武器的不足十个国家，尤其不是拥有数量惊人的毁灭性原子弹与可用于“常规战争”的核弹头及最先进的运载导弹的若干大国，而是被“推测”、怀疑已“具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两个亚洲中、小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如此“巧合”地刚好是美国政

府所确认的“邪恶轴心”三国：古巴、朝鲜、伊朗之二。此外，关于此次授奖的真义，在国际社会几乎成为共识的是，授奖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是出自一番不便明言的褒扬，旨在表彰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与美国的对抗。在美国出兵伊拉克之际，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不断申明：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已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求将核查延长“数月”时间；继而又未能配合美国对伊朗“核威胁”的判断，不时“还伊朗以清白”。为此大感恼火的美国曾动用合法、非法手段阻挠巴拉迪第三次连任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事一职。在此需要赘言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始终不同于其他诺贝尔奖项之处，首先是，其他各诺贝尔奖项固然从不曾真正自外于国际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争端，但毕竟多少受制于不同专业领域的游戏规则；而和平奖却始终是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局面的动态回应。其次，不同于由瑞典主持的、各专业专家评审产生的其他奖项，诺贝尔和平奖是由挪威国会——挪威各政党的联合机构组织评审。于是，和平奖，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议题，便首先基于挪威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并进而成为这一权力格局与国际政治情势间的对话。而在后冷战的坐标之上，由诺贝尔和平奖所呈现的挪威的国际立场与姿态，首先联系着欧盟，以及欧盟与美国这一新帝国间的诸多联手与争端。

二〇〇五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关于一九九四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影片《四月的某时》(Sometimes in April)的首映，引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影片中，在疯狂的大屠杀进行的当口，主使这场屠杀的胡图族军官如是回答美国官员：“你们不会插手的。你们怎么会来呢？我们没有石油，没有钻石，没有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此时，观众席上掌声雷动。笔者也加入了百感交集的鼓掌之中，而眼中是干涩烧灼的泪。是的，一九九四年，卢旺达。这个仅有八百万人的国土上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种族屠杀。在一百天之中，近一百万图西族人被杀，二百万人流离失所。而屠杀伊始，原本已驻扎于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英美的观望态度，

以不“越权”为由拒绝行动；长达三个月内，整个国际社会置若罔闻，袖手旁观，尽管只需出动约五千名联合国维和部队，便足以制止这场人间惨剧。如果说，那曾在柏林电影节上引发意味深长之掌声的对白，原本出自编剧导演的创作，那么，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美国高层官员确曾表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致使哈佛大学教授萨曼塔·帕沃尔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一书里写道：“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转引自李新峰：《“非洲人的命不值钱”——卢旺达大屠杀谁之过？》）

也正是在能源危机和争夺的意义上，美国和欧盟有着共同、却裂隙渐广的利益诉求。在柏林墙的创口上尝试弥合的欧洲，尽管不时尝试在这新一轮的环球争霸中小试刀锋，但毕竟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将自己隐蔽在影片《三色·蓝色》式的哀悼、歌吟与祈愿之中。或许这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一经获奖，法、德首脑即刻致电祝贺的微妙之处。

若说二〇〇五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真义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正面抗衡美国政府，那么，相当反讽的是，近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重点核查的对象，却始终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注点高度同步。最富反讽意味的是，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绝大部分“合理”依据，正出自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联合国的多达数十页的报告书，辅之以英美情报机构的（现已证明为“有误”的）谍报。换言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政府的冲突，并不在于是战争与和平，并不在于是否以“人权高于主权”或“国际安全”为名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仅仅在于是否“师出有名”。其分歧所在，只是该机构的运作程序与美国军方的作战时间表之间的吻合程度。若借用传媒用语说，该机构一直在伊朗问题上出演着“青天”的角色，那么，二〇〇六年伊始的一则新闻，相对和平奖而言，可谓“耳光响亮”：二月四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报告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其含义众所周知：相对于美国，这便是并非必需、但不无

益处的战争背书。风暴尚未平息的波斯湾再度战云密布。

在此,讨论二〇〇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寓意,并非质疑或论证这一颁授的“正确”与否。亦非出自笔者参与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〇〇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行动落败的怨声——因为介入之初,我所瞩目的,正在于这是又一次“注定失败的事业”,或者用行动的发起人、瑞士国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维尔莫的说法,是实践“一个疯狂念头”。于笔者看来,尽管在百年诺贝尔和平奖那一长串名单上,有着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纳尔逊·曼德拉、戈韦塔·门琴等屈指可数、名副其实的和平斗士,但一般说来,正是二〇〇五年的和平奖得主,更具代表性地呈现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现代世界主流的和平理念。和平,只是战争的对立项,甚或是暂停键;和平的努力便是与战争相推移;和平的赢得,只能是延迟的战争,或胜利者稍感满足的片刻,或各种势力达成某种岌岌可危的平衡或曰制衡的瞬间。而战争或暴力,却是现代社会逻辑内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注定的劫数。面对这样的主流逻辑与和平理念,“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只能是“疯狂的念头”,是幻想,乃至梦呓。然而,尽管噪声纷扬,但我们毕竟完成了这次行动。超越政治精英主义逻辑、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一次不可能的汇聚达成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之中,达成在一个迫使主流世界侧目的行动之中,达成在一卷二千二百页的巨书(此书赢得了瑞士文化部颁发的“年度最美图书奖”)之中。在此,汇聚起的是一个集体,一个由形象各异、独立而平凡的个人汇聚起的群体,一个种族、年龄、宗教、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性取向千差万别的群体。但是,这不是任何意义上利益的结盟,或为分享、猎取权力而集聚起的力量。这只是迥异其趣的另一扇窗、另一面镜:令世界看到为全球化的大屏幕所略去的画面,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画面,为生命而抗争的画面,自救而至助人的画面。迥异的和平理念是:不是、不只是相对于战争与暴力的和平,而是相对于生命、人类生存和明天的和平;不是、不只是战争、灾难、浩劫过后的橄榄枝,或无助、祈祷的

黄丝带，而是无言而倔强地站立着的生命之树。

在中国区，北京、香港和昆明举行的和平妇女聚会上，一向耻于真情流露、泪水轻弹的笔者，一次次地泪流满面，乃至不能自己。但那泪，是为动乎于衷而淌，是为终于窥见了希望而流。如同面对意气勃发的王选，深深地知晓这美国人口中的能“令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不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不只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而且是在为人类的尊严、人类记忆的权利、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为了“活着，并且要记住”。如同面对隽朗热诚的高金素梅，体认着她带领台湾原住民、自己的泰雅族人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讨还祖灵，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小泉告上大阪法庭；和自己的族人前往纽约，向联合国控诉日军对台湾原住民犯下的种种暴行；不只是在国族的意义上伸冤雪耻，也是在向日本、向世界昭示原住民——这一在现代世界上饱受苦难与剥夺的群体的存在与力量。还有“天国的女儿引我与和平妇女相遇”的黄淑华，她在泪水和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为我们背诵食指《相信未来》的农村妇女王树霞、英气勃勃的农民演出队的领头人王霞、用阿拉伯文引证着《古兰经》讲述和平道理、男女平等的女阿訇金梅花、香港女工合作社那些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女人们……一百零八位，一百零八个故事。讲述着和平的真义。另类的和平或朴素真切的和平。

或许，便从这里开始，寻找并构筑别样的故事，别样的世界。我感到欣悦，我参与了成就这场梦，我参与了尝试开启别样的现实。

二〇〇六年二月 北京

希 望 的 土 壤

刘健芝

我带着十二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的激动，走进二〇〇六年。

二〇〇六年，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新世纪头五年的动荡、苦难、暴力、